

學府流年

○ 赵俊贤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學府流年

趙俊賢 著

西北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府流年 / 赵俊贤著.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604-3005-8

I. ①学… II. ①赵… III. ①西北大学—校史 IV. ①G649.28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47901号

学府流年

作 者: 赵俊贤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 710069

电 话: 029-88302590 88303593

网 址: <http://press.nwu.edu.cn>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 装: 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5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520千

书 号: ISBN 978-7-5604-3005-8

定 价: 46.00元



目 录 |

西大人物

- 2 / 刘持生教授：严谨考据 述而不作
- 5 / 傅庚生教授：著名的古典文学鉴赏家
- 7 / 学者校长
- 9 / 平民校长
- 11 / 国学大家陈登原教授
- 13 / 史学大家陈直教授
- 16 / 西大兼职教授杜鹏程（上）
- 19 / 西大兼职教授杜鹏程（下）
- 21 / 附录1. 师友杜鹏程生活琐忆
- 27 / 附录2. 与杜鹏程合影
- 29 / 老红军的关爱之情
- 32 / 刘宪曾老人来校讲课
- 35 / 校长郭琦的素养与风度
- 38 / 著名作家张贤亮潇洒演讲
- 41 / 校友何西来
- 43 / “侯氏理论”“王氏定理”与中国的骄傲
- 45 / 与友人校党委书记董丁诚聊天
- 48 / 常务副校长刘舜康：与学者心灵共振
- 51 / 校友官员
- 53 / 午餐平凹家

西大人物

XIDARENWU

刘持生教授：严谨考据 述而不作

我1957年9月初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第一学年的主课是专业基础课《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先秦两汉段。主讲者为刘持生“老”教授。所谓“老”教授，其实才40多岁，但在我们这些刚从高中毕业的毛头小伙眼中已是老先生了。那时没有别的更年长的老师，大家尊称刘先生为老先生顺理成章。

刘先生博闻强记，几乎过目不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脑子就是一座中国古典文学的资料库。当然，先生并非食古不化者，而是消解资料，形成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这样的古典文学专家，今日恐怕很难见到了。刘先生喜欢夜读，率性而为，实为性情中人。他不大重视校方的作息时间表。第一次迟到，老先生说，校方发了课表，也不招呼是8时上课，我迟来了一会儿。我们学生觉得这个理由站不住脚，老先生大学任教一二十年，是教授，怎么连上午8时上课也不清楚？何况学校在课表上标明了授课时间。第二次迟到，老先生说，我家客厅的挂钟是否出了毛病，我还坐在客厅里，学校的上课铃就响了？我想，老先生手腕上有精良的瑞士表，何苦舍近求远？老先生毕竟是诚实者，不擅长说谎。此后，他总是迟到，淡淡一笑，同学们也报以微笑，算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但是，老先生一开讲，往往课间不休息，他允许同学外出“自行方便”。有时，一个上午内容讲不完，他声言，下午来辅导，其实是继续上午的内容讲下去。一讲又是三四节课。那时，老先生的体力真旺盛啊！

刘先生始讲《尚书》，次讲诸子百家及《诗经》。老先生口才一般，又有慢性鼻炎，讲起课来似乎很费劲。由于所讲作品古奥，先生表述佶屈聱牙，学生听起来分外吃力。如果讲到难点，老先生立即情绪高涨，会淋漓尽致地和盘托出资料与学术见解。他一边板书一边口述，一层一层地考证，直至将结论导出。如果遇到学术界有争议的课题，他遍列已有各家之说，逐一检讨、甄别，最后拿出自己的结论。老先生学问之渊博，令同学们叹服不已。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有堂课讲到《诗经》里“七月流火”一句，老先生从天文入手，在黑板上写满星宿，边写边讲解古历法，讲解天体运行与气候的冷热交替，最后作出结论，说明为什么“七月流火”。这一考证过程，竟用去了两节课。我和高年级同学谈起此事，他说，这个例证还不够最典型。老先生现在精简了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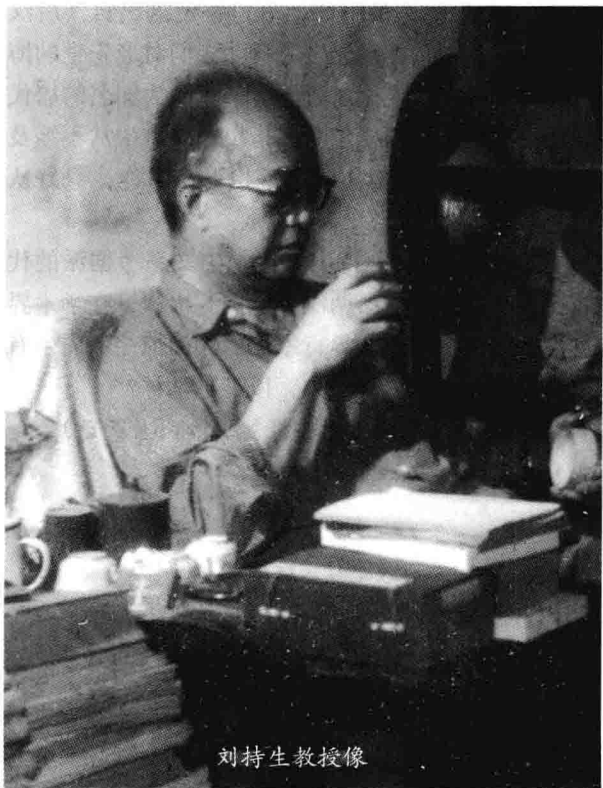
内容，当年为他们班讲授屈原及其诗作时，为了考证屈原的生卒年，也是在黑板上写满星宿，足足用去四个星期二十节课。同学们虽听不大懂，但刘先生不只精通中国古代文学、小学，还深晓天文地理，其知识积累之博与学术见解之深，令同学们大开眼界。

记得“文革”结束后，我校中文系联合全国数十所兄弟院校编写中国古代文学教材。教材研讨会后期留出两天日程，请刘先生到会议所在地胜利饭店与参加编写的中青年教师会面、答疑。刘先生有问必答，从先秦两汉到宋元明清的问题，无所不答，甚至可以说明资料出处在某书某卷，乃至更为具体。兄弟院校的教师大为震惊，纷纷发问：这么学贯古今的大学者、大专家，为什么我们原来不大了解？为什么在学术界知名度不高？

这与刘先生的治学态度及处世方式有关。先生是中央大学国学大师胡小石的高足。胡大师独立特行。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敬慕先生的学术、人品及其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决定颁发奖状以示嘉奖。胡先生得知，大为光火，拍案曰：岂有此理！我若为他们颁奖尚可，他们有何资格为我授奖！弟子们劝先生息怒，不去领奖罢了。学界传言，胡大师述而不作，其实不然。胡先生生前不发表文字，谢世后，家人及弟子打开先生的书斗、书籍，装订成册的手稿整整齐齐压在那里。将其交付出版社，胡小石文集陆续问世。胡先生，真乃名士风流。今日急功近利之徒，面对

先辈，岂不汗颜！

刘先生真不愧为胡大师的弟子。他淡泊名利，生性散淡，低调处世。1958年举国“大跃进”。先生曾说，人人争上游，泱泱乎西北大学，无下游何以成全此举？我来当下游吧。此论虽遭时风批判，先生亦泰然处之。先生终生喜述而不作或作而不面世。20世纪50年代，他讲课时油印一大册《先秦两汉文学史》讲义，此为先生大作。一出版社主动前来联系出版事宜，先生婉辞谢绝：不必急于出书，待修改几年再议。“文革”后，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社前来索稿，先生仍不同意出书。



刘持生教授像

我曾询问老先生，为何作此决定？常人千方百计找门路求人家出书，先生何以拒绝上门求稿者？先生当时以近似文言的书面典雅语言告我，原话不复记忆。大意是：出书是有出书志趣者的事，鄙人无此志趣，此其一；出书，要拿出自己的定论，而人在辞世前，学术见解很可能改变，书出版，要修订不易。例如，我发过关于陶渊明的论文，至今不少大学仍将我的学术观点引入教学中，说刘××云云，其实我早已有所改变，这岂不是麻烦事？我插言：“你可以再论陶渊明嘛！”先生笑了，“何必呢？那不是自找烦恼吗？”先生不曾明言，我想除过淡泊名利外，对学术界极“左”风气有所顾忌，或许也是一个原因。

据我所知，刘先生生前仅发表过两篇学术论文，除过上述论陶之长文，另一篇为1956年《西北大学学报》所刊发的关于《诗经》分类的研究。嗣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汇编《诗经》研究论文集出版，从全国数百篇有关论文中仅筛选出十余篇，而刘先生的论文赫然位居其中。

我当学生时，去过刘先生家。他的书房里似乎看不到平装书，一排排书架上全部是线装古书。他的古籍藏书似乎比中文系资料室更丰富一些。至于老先生的博学，还有两则轶闻。其一，林彪事件后，中央文件下达毛主席致江青的信，其中有古语“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学习文件时对于这古语的出处，古代文学教师只能猜想，无人拿出断语。刘先生惯于迟到，他一踏进会议室，有人开玩笑，说您迟到了，要罚，令您说出此典之出处。刘先生不慌不忙，一口肯定这出自《后汉书》，大致在某处某页。资料员取来翻检，果然不出先生所料。人们对老先生的博学与记忆力惊讶不已。其二，有次几位学人在刘先生家聊天，一位颇为知名的唐代文学大家顺口说杜甫诗作中有涉及某山之诗句。刘先生断然指出，杜诗中从不涉及此山。那位专家信手从刘府的书架上抽出《杜工部集》，翻检一小时许，只好认输：误记了。

20世纪80年代郭琦任西北大学校长时曾说，刘持生教授是中文系考据派的代表人物。刘先生辞世后，我校出版社将其遗著《先秦两汉文学史》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家人将其诗作《持盦集》出版，一些诗界行家读后大为惊诧：先生有这样堪与古代诗家比肩的诗作，为何生前不及早展示世人，以嘉惠学林？

（原刊《延河》2007年第8期，又见《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5月25日）

傅庚生教授：著名的古典文学鉴赏家

我校原中文系在国内外学术界知名度最高者当首推傅庚生教授。新中国成立前，傅先生以其1946年商务版《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学术地位；以其1943年开明版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学鉴赏中独树一帜的学术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杜诗研究的多部著作，使其成为声名显赫的杜诗专家。20世纪70年代，郭沫若在关于杜李的专著中，把傅先生作为主要学术对手之一。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鉴赏文存》一书，选入中国现代数十名家的有关论著，可谓集鉴赏经典文献于一册，傅先生的《创作与品鉴》（有关专著中的一章）与现代大家叶圣陶、李广田、郭沫若、郑振铎、朱光潜等人的文章比肩并列。“文革”中，傅先生的著作内地停止印行，而在大陆之外的华人地区与国家，不断有盗版面世。

傅先生的学术专著与一般纯理论专著有所不同，它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高度统一，集理性论证与艺术欣赏于一体。文笔俏丽、奇拔、华瞻，堪称美文。阅读时，不只可获认识之启迪，更会有美的享受。有些著名作家对傅先生的著作和报告演说推崇备至。傅先生的学术成果，影响广泛而深远。

傅先生气质高雅，举止潇洒，谈吐幽默。平日毛料服笔挺，皮鞋总是擦得一尘不染。侃侃而谈时的表情与手势颇为优雅，令人赞叹。

傅先生授课，只用提纲不备讲稿。他从不照本宣科，擅长自由联想、随心所欲地发挥。记得有次他讲课时，蓦然离开文本，大肆发挥，尽诉题外之论。先生说，青春是人一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一定要把握住而不要有负于它。你们正年轻，走路要有精神，不要迈八字步，上楼可以跑步前进；你们要多看看蓝天白云，这是一种人生享受，到了我这等年纪（其实先生当时40余岁），看天空常是灰蒙蒙一片，很难发现蔚蓝色了。你们爱吃什么，例如黄瓜要有滋有味地去吃。若至我这样年纪，吃什么也不大香甜了。这段话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傅先生讲课时板书从不循规蹈矩，兴之所至，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或大或小。先生的粉笔字写得刚柔相济、飘逸峭拔。我的大学教学生涯，深受傅先生影响，也喜欢用提纲教授，也喜欢联想与发挥。不过，远不能达到先生的境界。

傅先生倡导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时“不要戴白手套”，意思是不要怕它们污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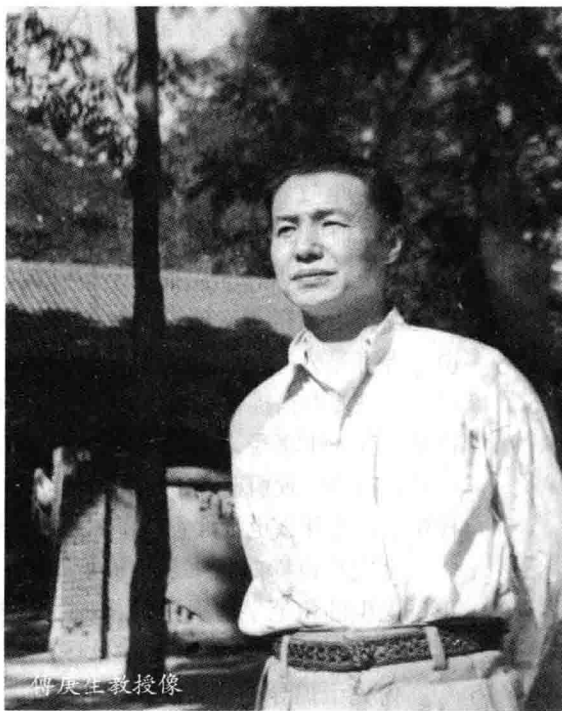
了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要“入乎其内”，细心品评古典作品的滋味，然后“出乎其外”，对其做出恰当评价，以取其精华，剔除糟粕。这说明傅先生所倡导及实践的文学鉴赏，是文学阅读中的双向交流，是鉴赏者的艺术再创造。先生的这一见解并不错，但在20世纪70年代极“左”思潮泛滥时却大遭挞伐。

傅先生关于文学鉴赏的著名主张是，欣赏文学作品要有“水磨功夫”，即要有韧性的仔细的长期的咀嚼与品味。傅先生授课时，对作品中细节与语言精句的品评，令人拍案叫绝。

有次傅先生本在讲唐诗，忽然联想论及王实甫《西厢记》中的一句唱词。此剧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写到张生游览普救寺，邂逅相国小姐崔莺莺，一见钟情。张生唱道：“且休提眼角儿留情处，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傅先生对这句“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反复低吟，啧啧称绝，击节赞赏。然后，先生娓娓阐释为什么会“脚踪传情”。首先，张生在小姐走后，过去留心观察审视她所留下的脚印；其次，说明雨后地软，兼之落英铺地，三寸金莲留下了印痕；复次，脚印儿很浅，说明小姐身轻如燕；再次，脚印儿很密，说明小姐在流连张生，不肯迅即离去；最后，脚印不是向前，而是扭向后边，说明小姐在扭头向后偷窥张生。在这里，我只能根据记忆，大致讲个梗概。傅先生的赏析十分细致精彩。仅此一句唱词，先生讲去整整一节课。试想，先生的“水磨”功夫何其深厚！真令人叹为观止。

先生晚年经年卧床，备受疾病折磨之苦。先生辞世前半年左右，我和我系古典文学教师赵俊玠同去探视。先生头脑清晰，风趣地说：“你们二位的关系很难弄清楚。说是兄弟吧，一个是甘肃人，一个是陕西人；说不是兄弟吧，姓相同，名字又相连。”但是先生辞世前三个月左右，我去为先生送学校的节日慰问品，他已不认识我了，反复发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怎么好面善呢！”我反复说明，他并不接我的话头，只顾自言自语。我不免凄楚悲哀从中而起。先生终其一生，纳草吐乳，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耗尽了全部心血。然而，先生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令人心寒，尤以“文革”为甚。倘若天假先生以年，岂不是学界幸事？

（原刊《延河》2007年第8期，又刊《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6月8日）



傅庚生教授像

学者校长

我读高中一年级时，刚刚从西大毕业的一位年轻老师教我们的历史课。他在课堂上谈到侯外庐先生。他说，侯先生是世界著名的史学家。苏联的斯大林对身旁的人讲，你们若有中国历史方面的疑难，可以去请教中国的侯外庐。又说，侯公现任西北大学校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其时，我在山城的新华书店看到侯氏所著砖头似的巨著。我在想，能写出这般大部头的人，必是大大的学问家。但毕竟不知侯公为何许人。经历史老师一点拨，侯公的形象在心中立即高大无比，成为我心目中的学术偶像。年长后，我接触过一些关于侯先生的资料，却并未见到斯大林的评述，不知我的中学老师的资料出自何处？

我1957年入校时，侯先生名义上还是西大校长，大约不久上级即免去侯的职务，改由党委书记刘端芬兼任校长。听高年级校友介绍，侯氏的西大校长为政务院任命，周恩来总理找其谈话并签署委任状。

作为一校之长，侯公的主政才能如何，不得而知。只是听人们说，侯校长大事自己定夺，日常工作交给秘书去办。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教师评职称时，人们争议颇多。有人就讲，现在投入这么多人力，下这么大工夫评职称，还未必准确，当年侯校长一人发聘书，几百教师皆心服口服，并无不公之情节。这是怀旧，也是人们对侯公执政才能的认可。

神龙见首不见尾。侯校长成为传说中的人物。我们学生渴望见这位大人物一面，但四年大学生涯未能如愿。

1962年11月，侯外庐先生应邀回校参加校庆活动。11月15日，他在礼堂为教师作关于科学研究问题的学术报告，我有幸到场聆听。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我心仪经年的名专家、老校长。

侯先生在有关人士陪同下缓步登上舞台。他留大背头，身着质地考究的黑呢大衣，一副文质彬彬、儒雅矜持的气度。舞台中央是侯先生的报告席，东侧是报告会主持人席，西侧置放大黑板，由侯先生的助手伺立一旁，先生讲到专有名词或引文，助手即主动板书。先生俨然一位大学者的做派，这个形象正好和我心目中的偶像相吻合。先生坐着作报告，报告内容相当丰富。我集中精力倾听报告，未曾做笔记。至今想起来，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先生极为强调与

倡导甘于寂寞的治学态度与精神。用先生的形象说法，要乐于坐冷板凳，不要急功近利，追逐浮名。他甚至要求大家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不要为世俗所扰。我记得，先生强调要静心读书、著述，不要去关心什么几两油票、几斤肉票、几尺布票之类的东西，那样会分散精力。这段话，我听时不大以为然。我想眼前经济生活困难，先生是高干、高级知识分子、社会头面人物，政府有特殊供应，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可能少一点，但一般老百姓不能不为填饱肚皮动心思乃至奔波。也许，先生可能不知民间疾苦。其二，先生强调资料真实的重要性，一定要掌握第一手资料，不要辗转相抄，以讹传讹。其三，先生提出并阐发了学术研究要寻找并抓住学科“生长点”的重要命题。先生说，一个从事某门学科研究的人，一定要掌握本门学科的发展史，进而了解本学科的研究现状，从而寻找出本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展望学科的前景，从“生长点”出发确定科研选题，这样才会对学科建设有大的贡献，才会取得重大科研成果。

侯先生关于学术研究的中肯而深刻的论述，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乃至渐渐融入了我的心灵。我日后的学术研究，受到先生的积极影响。

（原刊《西北大学报》2005年9月20日，又刊《三秦文史》2007年第1期）



平民校长

刘端芬先生长期担任西大的一把手。20世纪50年代，他经常给师生员工作大报告，有时在礼堂，有时在礼堂外广场。我从小县城初来大都市时，听惯了陕西方言，对别的语言接受能力极差。刘校长的报告，我几乎听不懂多少，常常是规规矩矩地干坐在队伍里，虽然用心去听，总不知校长所云。校长常常一边吸烟，一边讲话。一根烟燃完，又换一支。讲话的同时擦火柴，火柴燃着了，他不及时点烟，只是举在手中随着讲演比划手势，待火柴烧了手指才本能地扔掉；不一会儿又划一支，又不去点燃，又烧手指，如是几根火柴用过，方去点上烟猛吸一口，随之又将烟拿在手里让其自燃。作报告之时，刘校长往往讲到得意处，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我和不少新同学却一脸漠然，莫名其妙。

刘校长不修边幅经常穿一件黑色呢大衣，并不系纽扣，走起路来，大衣迎风前后摆动。1958年初，开展反保守、反浪费运动，校园里图书馆前的大道两边贴满、挂满大字报。我和不相识的同学一同阅读。刘校长快步走来，他看了会儿大字报，身着大衣就席地而坐，招呼我们蹲下。他问我们，有没有写大字报？有没有发现学校有什么问题要揭发？鼓励我们不要有顾虑，如果有人打击写大字报者，可以去找他，他会处理。刘校长是延安窑洞里来的老干部，是根据地的老教育家，为人质朴随和，毫无官架子。

刘校长善于联系群众。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大的教工大约不到千人，据说刘校长全部认识，连炊事员的名字也可以呼出。学生中的头面人物，他也认识。他经常去教室听课，事先并不打招呼，也常常到学生宿舍走动。我们一年级第一学期的1957年9、10月间，全班同学讨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问题。原来国家的教学大纲规定，培养汉语言文学研究专家，后改为培养汉语言文学工作者。同学们各抒己见，甚为热烈。有的主张，四年不可能培养出专家来，提培养工作者即可；有的说，要规定培养劳动者，否则可能堕落为“右派”。这显然是当时“左倾”思潮的反映。又有几位同学大力主张不要培养研究人才，要写明培养作家。刘校长中途来到我们宿舍楼走廊，坐下认真听取同学们发言。会末，主持讨论会的班干部请刘校长作“指示”。刘校长点燃烟吸了一口，微笑着说：“大家正在讨论，我怎么做‘指示’呢！我谈点看法，供你们参考。”刘校长首先肯定同学们认真讨论的态度和民主自由的气氛，其次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还是要以培养理论研究人才为主，以培养应用人才为副。他不同意规定为培养劳动者，大学毕业生的特征在哪里？他说，是要培养有专业特长的劳动者。至于培养作家，他不同意这个提

法。他说，现实告诉我们，作家是社会培养出来的，是现实生活培养出来的，是创作实践培养出来的，学校里可以培养文学评论、研究人才，不大可能培养作家。至于个别同学会成为作家，这只是个例，不可以成为统一的培养目标。

刘校长刚讲完，同学们掌声尚未落定，有个喜欢写诗的同学立马站起，大声说：“我不同意刘校长的观点！中文系必须培养作家，也完全可以培养作家！不同意培养作家是守旧的思想观点……”主持讨论会的学生干部神色紧张，示意发言者中止，刘校长摇摇手：“没关系，让这位同学继续讲。”刘校长临走时一再表示，不同意见可以充分发表，自由讨论，不必匆匆忙忙作结论。

翌年春，我们班利用星期日到临潼踏青游玩。我和一位同学沿华清池随意走动。忽然看见刘校长陪同两位外宾走过来。我觉得校长有公务，不便打招呼，向路边靠去，恭送校长一行。岂知刘校长有意放缓脚步，让翻译陪外宾先行。他留了下来，指指我们胸前的校徽：“你们是西大同学？”我们向刘校长问好。他招呼我们和他在路旁的石凳上落坐，解释似地说：“陪外国客人也够累人的。让翻译人员先陪他们玩儿，我和你们坐一会儿。”他看看我们，恍然大悟似地：“你们是中文系的？”

我们叹服刘校长的记忆力。我们向刘校长汇报，那次讨论培养目标，有同学反对刘校长的观点，事后，班干部狠狠批评了这位同学。刘校长问：“批评他什么？”我们说，批评他不尊重领导，有自由主义思想。刘校长开心地笑了：“这扯到哪里去了！回去告诉班干部，不要这么干，不要压制民主。”

“文革”后，刘校长任陕西省委党校校长时，从北京参加党代会归来，应西大邀请，来校为教工作传达报告。他在报告伊始，除过向西大同仁问好，还诚恳地作了“检讨”。检讨说，他主持西大工作时失误很多，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和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省委书记赵守一，联手把西大从中央归属硬要回陕西省，改为省属大学，这个历史失误给西大的发展带来诸多困难；另一个是他主事时，片面强调勤俭办学，年年上缴基建款，修建教工宿舍楼较少，“今日同志们的住房困难，我要负责。”人们对老校长的思想解放与醒悟，表示欢迎和谅解。

刘校长主持西大工作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那是一个“左倾”思潮严重的岁月。平心而论，要刘校长一人对工作失误负责，有失公允。老校长所言两个失误，楼房盖得少了点，固然影响了教职工生活，但这毕竟还可以弥补。今日西大的住宿条件已有了跨越式的改善。但是，将学校改为省属，实为历史性的失误，而且至今难以校正。诚然，主要责任在赵守一，他贪大求全，要建立陕西省的独立高教体系，西大遂归省属。历史证明，他的高教体系梦并未圆，却使西大的发展受到很多制约。

刘校长是西大校史上历史性的重要人物，后人要缅怀他，也要研究他。研究他是为了今天教育事业的发展。

（原刊《三秦文史》2007年第1期）

国学大家陈登原教授

百年高等学府西北大学代代绵延的数千名执教者中，先后有过若干大师级的人物。其中陈登原教授颇为独特。先生在世时，数十年为世俗偏见所蔽，未曾得到应得的重视。自20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先生国学大师的形象方冉冉浮出水面。历史走了一个“之”字形，公正地还原了先生的本来面目。

陈先生1900年出生于浙江余姚。1926年东南大学毕业。先生在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教。1950年赴西北大学历史系执教。1974年病逝于西北大学。任职期间，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讲授过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史科学、中国田赋史等课程。著有《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国田赋丛考》《中国田赋史》《中国土地制度》《中国文化史》《历史之重演》《荀子哲学》《颜习斋哲学》《国史旧闻》《金圣叹传》以及《天一阁藏书》等十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谓先生著作等身，实非溢美之词。

从上述书目可以看出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学科领域学术成果的广度与深度。先生之学问涉及中国古代文化、哲学、文学，土地田赋及史料典籍等等诸多学科领域。有若干著作已成为史学经典，流播于世。先生的学问既渊且博。先生不仅是史学大家，更是国学大师。

20世纪50年代陈登原先生被评为二级教授，傅庚生先生被评为三级，文科其余教授均为四级。陈先生对此有何看法？不曾耳闻。倒是傅庚生先生颇有异议。他说，西大文科为什么不评一级教授？陈登原先生就是一级。当时有人以理科评有两名一级教授而文科独无，批评校方重理轻文。不过有无重理轻文倾向是一回事，陈先生可否评为一级教授又是一回事。这二者有关联但并不等同。傅庚生先生人不微言不轻，其意见为何得不到重视？究其实，这是当时的学术价值取向所致。其时，凡事皆讲政治第一，陈先生理所当然的是资产阶级史学家。请君举目遍望50年代国内，除陈寅恪、俞平伯、钱锺书、朱光潜等世界级学者外，文科还有多少一级教授？

20世纪50年代中期，陈先生的皇皇巨著《国史旧闻》面世。它的出版，曾引发一场风波。出版社在书稿发排后，先生为稿酬事与其发生争执。社方将稿酬定为千字若干元，先生不同意，提出必须千字15元，和郭沫若同酬。当时郭氏为人大副

委员长、国家要人，又为史学界巨擘，陈先生欲与其一般取酬，实为学人自重学术成果，自尊、自爱人格之举。出版社不同意，云：郭氏之书为史学著作，陈氏之书为史学之史料。陈先生辩曰：书中所引史料后之“登原按”岂不是本人学术论述？据同行专家公允断言，《国史旧闻》是一部体例独特的中国古代通史，当然属于学术专著。陈先生还表示，如出版社不接受要求，请退稿。出版社考虑到一则此书学术价值颇高，二则已排版。若退稿经济损失颇巨，只好答应先生之要求。但其书出版后，出版社致函西北大学，“揭发”陈先生“争”稿费之事，要求校方“教育”并“帮助”其清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后此信被以大字报形式公之于众。于是乎，掀起一股批陈名利思想的小浪潮。陈先生当时写小字报摆事实，讲道理予以反驳，实为有理有节、有骨气之举。今日看来，出版社某些人的行为很不地道。此事无须赘评。

祸不单行。1958年文科开展学术思想大批判运动，陈先生又首当其冲。陈先生的《〈国史旧闻〉自序》云：“国史旧闻者，余姚陈登原戊寅后所撰书稿也。”下文则考证先祖何时由北方迁徙而至。此为自传，文云：“登原之未入小学，已通代数，未入中学，已知几何。”又云：“犹忆儿时为大父温足卧，每乙夜未眠，或五更梦醒，我为祖诵‘关关雎鸠’，祖亦时时穿插作谑浪。”次表子女行状。大字报批判此序言为封建士大夫习气，为吹牛之举，为光宗耀祖之封建思想大暴露云云。其实古人之著作，自序大多是这么写的，先生不过沿用惯例而已。至于说“未入小学”等等，辛亥革命后的“高等小学”课程设置实与后世之“中学”相当。所谓“通者”，乃懂也，了解也，并非精通也。显然先生幼年家学根基甚厚且聪颖过人。

此后陈先生在西大一直郁郁不得志。“文化大革命”中，先生再次受到冲击，于“文革”后期含恨辞世。其间，先生的著作在大陆之外屡屡被盗印。

20世纪末，陈先生的《中国土地制度》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人的著作并肩作为“国学丛书”刊行。此后，《国史旧闻》新版问世，被若干博士生导师指定为攻读学位必读篇目。这说明，学术界公认先生为国学大师。2005年，文化品位颇高的《文汇报读书周报》在一篇议论“旧书新出”的文章中说：“以笔者寡陋的阅读视野所见，民国旧版图书，如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张季鸾《季鸾文存》等，都是读书人炙手可热、广为求索的宝贝。”

“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登原先生并非“饮者”，却以其经典著作名垂儒林。

（原刊《西北大学报》2005年12月30日）

史学大家陈直教授

陈直先生终生别无旁骛，孜孜矻矻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与教学。先生勤勉始终，收入菲薄，真一介清贫鸿儒。

陈先生1901年生于江苏镇江。1940年前担任过家庭教师、县志编修委员等。曾考取清华研究院，因家贫未成行。1940年至解放，一直在陕、甘地区银行工作，主要从事古文物鉴定。1950年入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致力于中国考古学和秦汉史的教学与研究，并指导硕士研究生。陈先生讲授过考古学通论、秦汉考古等课程。中华书局委托西北大学历史系标点《汉书》，先生任总校。先生的学术专著有《汉书新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史记新证》《三辅黄图校证》《摹庐丛著七种》《居延汉简研究》及《文史考古论丛》等。

陈直先生执教西大，被聘为讲师。其时，有人认为如此聘用不公。但是，陈先生无学历、无文凭、无学位，似乎委任讲师并无不妥。但是，日后陈先生的著述陆续问世，才学日益彰显，学术界评价步步高，在这种情况下，校方不为先生晋升职务，显然不大合适。



陈直教授

陈先生的职务待遇，引发史学家有识之士的评议。有位著名考古学家就陈先生职称事，批评西大“墙内开花墙外红”，对陈先生不够重视。著名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于1963年邀请陈直先生赴北大讲学。北大向学生公布，陈直教授前来设帐。事实上，他仍是西大的“陈直讲师”。鉴于这种尴尬局面，西大授予先生副教授职务。先生手头拮据，出门无可行头，学校为先生置办毛料中山装一套，以壮行色。陈先生在北大半年讲学，深得听众的热烈欢迎与真诚钦佩。先生讲学归来，在西大仍安居副教授之教席。先生